

社会运动和社会理论

〔英〕艾尔曼 (Ron Eyerman) 史宇航译 李国海校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代西方社会中象和平运动、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那样的“新的”社会运动呢？是否要将它们与“旧的”社会运动如工人阶级运动相比较或相对立来加以确定？本文将阐述规范性的社会理论，如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新历史唯物主义与其对当代社会运动的评价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将论及图雷纳 (Alan Touraine) 的行动理论。目的在于表明，这些理论对理解和评价当代社会冲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

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经过五种或六种“生产方式”。除“原始共产主义”之外，每种生产方式都由多多少少是层次性的结构所构成，这种结构由劳动分工决定，并由社会阶级赖以确定的财产制度所认可。说得通俗些，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水平上，要确定社会各阶级，就须看它们与某种特定生产方式内的生产手段的关系如何。不仅确定和分析社会阶级要用这种方法，而且判断它们也要按照从生产方式理论中推导出的标准，即它们是否会阻碍“进步的”社会变化。分析某种生产方式内的社会冲突要看冲突的“阶级基础”和“利益”，要确定它们是否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向更高的历史阶段的转变。在这里，历史是当作一条由原始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途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跳过某些阶段？在推动和指导这一发展过程时不同社会集团（如知识分子）和阶级起了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在苏联的和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当中长期存在着争议。

就所涉及的经验社会科学而言，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社会运动，其方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探究任何现象的社会（阶级）基础。近来，一本研究“北欧民众主

义”的专著就是把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例证，其书名是《民众主义与政治不满：对小资产阶级活动的研究》。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从确定的阶级理论开始的，并精心设计一个可将观察到的社会冲突放置于其中的框架。正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本书的主要前提之一是认为，民众主义的基础就是反对对简单商品生产的实际的或感觉到的威胁。因此，小资产阶级成了民众主义的基础。”

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只允许有两个实际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其余阶层从历史上和文化上来看不过是分支而已，因而必须分别地和个别地按经济的政治的“联结”加以分析。这样，现在的历史唯物主义便认为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阶级位置”的区分和划界。然而其核心思想是，把历史当作生产方式的嬗递的观点不仅包含对阶级界限的划分，而且包含了判断新型社会冲突的标准。因此，企求回到以“简单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过时生活方式中去的民众主义或罗曼蒂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运动是反动的。

要知道，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政治倾向孰左孰右是确定的。从两大实际阶级中产生两极。两大阶级间的冲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他冲突是次要的，因而必须附属于基本矛盾。著名的“妇女问题”为这种政治理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男女冲突，这种照理可以按本身具有的性质进行分析的现象，一旦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就必须用左——右极来分析，并按基本矛盾来确定。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时总要问，“这种运动为谁的利益服务或代表谁的利益？”

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新的社会运动确实是新的：它们出现在劳资两极之外，而要分析并正确理解它们又必须与两极联系起来。

帕森斯和现代化理论

帕森斯主张,可以从四个相互依赖的、但在分析中又应加以区别的进程来衡量进化。(1)日益分化的过程及一个社会中自治的“行动单位”或系统的形成。政教分离,工业中的管理脱离生产职能,这就是帕森斯所谓分化的两个例证。(2)与上述分化有关的适应过程以及一个社会系统由于次级行动系统和组织系统的分化而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再以上例为证,一家公司由于管理脱离生产而获得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活动范围会增加它在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适应性”。这种按整个系统的适应能力来衡量的进化,对社会整合造成了一种压力。这是帕氏理论的核心,也是他分析社会运动的主题。(3)按照帕森斯的说法,社会进化可根据参与社会政治过程的总人数来衡量,这是数量的而非质量的标准。参与者越多,由于种族、年龄、性别和财产原因而被排除者越少,则社会越加现代化,社会系统就愈能适应并发挥功效。所以在帕氏模式中,现代化与民主政体和普遍参政溶为一体。(4)衡量社会进化的最后一个进程涉及社会中“价值观的普遍化”的程度。这一术语指指导合理行动的价值观变得日益抽象和富有弹性的过程。

帕森斯的社会进化和系统理论只按社会冲突对现代化的功效如何来分析它们。正如一位评论者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把社会运动贬低为一种社会功能的补充函数:它们告诉系统应予控制的社会现实;它们保证整个系统的适应性”,最后就把社会冲突变成“现代化精英借以了解社会问题的寒暑表”。

帕森斯把社会运动的力量、影响及其方向都解释成特定的行动系统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压力的结果。个别参与者以及集体行为孰进步孰落后都根据其现代化的作用而定。这样,行动者的“利益”,他或她的目的与打算就与一种有目的的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

所以判断和解释社会运动的标准来自构成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分化、适应、参与(inclusion)和价值观的普遍化。新的社会运动,比如妇女运动,如果是由于经济的和政治的行动领域中的不平衡发展而形成的,如果它表现了妇女想以平等

成员“参与”的愿望,或表现了要求重新确定妇女在社会中所扮角色的愿望,亦即它是为了“价值观的普遍化”,并由此使行动个体和系统取得更大的自由和适应性,那么这种运动就是进步的。如果一场生态运动旨在“退出”同样的政治和经济过程,或者回到“简单的生活方式”中去,那它就是落后的。如果两种运动都抵制价值观的普遍化,如果它们起劲地促进特殊利益,它们就是“功能主义的”,因而也是倒退的。

与此同时,解决社会冲突的程序也在进化,也是“新”的。平衡——失调——重新协调,这就是帕森斯给社会变化定下的基本公式,这里包含了这样一个见解,在社会进化的每一阶段,都会形成一种更高级的解决冲突(重新协调)的形式。所以,社会进化就是一个不断发生冲突和不断适应的过程。但是有一个问题帕森斯仍然没有解决,即社会运动是不是一直以同一种方式进化的,或者,所有“肇基者”的身份是不是一贯不变的。

哈贝马斯与现代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接受了以发展阶段理解人类进化的观念,然而他又用所谓“组织原则”代替“生产方式”作为划分发展阶段的方法。在这样做时,他摒弃了社会阶级的概念和与阶级斗争有关的观念,而赞成“一种不会遭到历史哲学中客观主义批判的较弱的观念”。进化到特定历史时刻的规范化框架在结构上构成了社会冲突,这一结构是自主的,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无联系。哈氏的新观点接近于上述的帕森斯模式;实际上,他的重建理论同韦伯和帕森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极其相近。

哈氏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混合物,所以他对新社会运动的判断标准也是根据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观点而制定的。哈贝马斯站在帕森斯的立场上,反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和它对普遍的历史主体的基本设想,即随着生产领域的发展而形成的工人阶级是历史主体。他赞成那种强调不同行动体系之间产生紧张状态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指明适应的普遍性过程而非集体主体。这样,普遍性就是判断社会运动中各种主张的核心标准。但哈贝马斯不同意帕森斯现代化理论中这样两个设想,即(1)历史可以说是一条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分阶段发展的过程，可以沿着这个过程来衡量“适应”和“分化”；

(2) 现代化了的杰出人物是新社会秩序的真正代表。哈贝马斯认为，新的社会运动正是为了反对这些杰出人物才应运而生的。不能按照普遍性的现代化理论来判断社会冲突是进步还是反动。事实上，哈贝马斯在判断新的社会运动时，把他自己的推理方式从结构分析和重建的历史逻辑的语言转到了行动观。即判断社会运动不是看它们的“社会基础”或与“现代化”的关系，而是看它们的实际的和潜在的“意向性”，这是卢卡奇的方法，它把社会运动体现的实际的阶级意识区别于外加的阶级意识。

哈贝马斯从总体分析转向对行动者的人生观的分析，为理解社会运动展示了另一种有关的可能的途径。

行动理论与行动者的观点

行动理论研究社会运动的基本原则是：研究集体行动可参照个别行动者的模式。这包括三方面：(1) 行动者的意识，他或她的自我知觉和身份；(2) 自我和身份据以形成的“他人”；(3) 情境，即行动的构架，行动者通过集体“确定情境”来确定自己在构架中的位置。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可对照这个模式的各个组成方面来进行。图雷纳(Touraine)认为，根据各种社会运动综合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可以把它们区别开来。

象个人行动一样，集体行动也是有目的的，指导这个行动的是行动者对情境及其所包含的利害关系的确定，并且与自我(团体)身份据以形成的“他人”有关。在现代社会中，这种集体意志在既成的社会结构与新型的可能的社会秩序之间起了媒介作用。图雷纳指出，现代社会的特征由其历史性所赋予。现代的或者说新的社会运动就是形成新的身份和“检验”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的社会进程。因此，现代社会运动的发展逻辑与社会制度的逻辑关系不大。必须从行动的观点来研究社会运动，必须按照它们固有的目标、意向以及它们构成的新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去理解和评价它们，所以，重要的是过程，在社会冲突的过程中，新的个人和集体身份形成了，得到体现，继

而受到挑战，又重新形成。

按照图雷纳的解释，在理解新社会运动时采用行动者的观点并不意味着系统理论和结构定向理论不重要。相反，他提出的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生结构转变的理论，正是要掌握一种更为广泛的系统观。他的社会学干预方法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系统观之上，社会学家就是要传达某些社会冲突中政治意识发展的情况。图雷纳从他的社会转变理论中引出了判断何种社会冲突才属进步，何种社会冲突才能发展成真正的社会运动的标准，那就是看社会冲突是否具有向治国的精英提出挑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

对图雷纳来说，标志和主导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就是某种社会冲突和对抗的社会运动。工业社会的特征就是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和为确定所有制和工业生产组织所进行的斗争。其中，基本的社会运动、统一的力量和未来冲突发展的主要方面是工人运动。但在所谓的转变阶段，这种工人运动不再起进步的、历史创造性的和统一的作用。因为生产关系中的变化以及资本控制者改变投资方向使这种工人运动的具体行动变得分散了，大多采取守势或被纳入现有的权力模式。在后工业社会中，显示其特征的不再是围绕着劳动组织的斗争，而是围绕着控制传播系统的斗争。这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在他研究的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地区运动中，只有第一种即法国的生态运动才展示出有能力在后工业社会中起统一的作用，就象工业社会中的工人运动一样。我想指出，他的“行动理论”也依赖于一种结构发展和历史发展的理论。

若干政治的和理论的结论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理论与政治冲突之间有一种很难确定的关系。上述各种理论都提出了评价当代社会运动的标准，它们都包含了重要的政治假设和推论。历史唯物主义者常为将历史发展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冲突直接联系起来而自得。但我想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新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持保守的态度。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三者都把历史看成一条普遍的

和分阶段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朝着总的目标前进时会克服复杂性和反动的趋势。依帕森斯之见，这一过程将产生这样一种观点和判断，即作为“现代化了的杰出人物”的专业人员就是普遍性的现代化理性的目前代表，新的社会运动就是需要这些杰出人物去解决社会紧张状态的证据。哈贝马斯用一种更为复杂的方法来论述专业杰出人物与群众的关系，但他的社会进化理论也适用于对新的社会运动作规范性判断的问题。

图雷纳用行动观研究社会运动，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社会理论和对社会运动中的专业人员的作用，或者讲得广泛些，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此观点，理论不仅要关心结构变化的方向，更要关心在社会冲突中发生进化的行动构架和身份的重建。但按图氏这种主张，理论就无法洞察组织社会的正确途径；也无法洞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法则以及正确的行动方式。

从上述对工人阶级那种“旧的”社会运动所作的理论分析中还可以得出一些政治的结论。判断社会冲突的各种历史发展理论和“新的”“旧的”这类术语是揭示性的。这一点，图雷纳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认为，在发展的每一阶段，只可能存在一种统一的敌对的社会运动。多样性只能导致分裂，并为统治精英提供一种成功的分而治之战术。所以历史应该寻找新的运动来代替过去的。这种设想肯定要受到疑问，这就象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确定工人阶级为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体一样。哈贝马斯认为，唯一能够实现工人阶级最终理想的，是女权主义运动；图雷纳认为，唯一能够代替工人阶级的，是生态运动。在我看来，唯一的结论是：“历史”不象是可以作政治判断的最可靠的场所。

（摘自英国《社会学》1984年2月号）



（上接第30页）

批评，就必然会歪曲历史。

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尽管所有的历史思考都是批判性的，但并非所有的批判性的思考都是历史思考。认为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根本就称不上是历史学家，这种众所周知的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上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纯客观历史的概念（即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理想的；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沉着冷静的品质，不如说是一种试图研究史实的目标。尽管它是一种理想，但绝不是神话。

正如我们十分小心翼翼所指出的，就历史而言，虚构的思考和批判性的思考之间的区别，仍

然是正确的和重要的。

这样说，并不是说所有历史著作彼此都是相同的。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优秀的历史著作的完美却各不相同。在跨越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目睹许多历史学家勤勉奋斗的业绩。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有一些是十足的悲观主义者，有一些是热情的乐观主义者；有一些是勤勤恳恳的编年史者，有一些是富于哲理思想的作家；有一些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些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在风格、思想和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能深入钻研历史。我认为，第一位历史学家不是摩西，而是希罗多德。

（摘自美国卡瓦诺编《西方史学名著选》一书 1982年版）